

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的建构逻辑及实践

罗静¹

【摘要】：中国边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边疆治理最大的挑战是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如何处理边疆地区的社会文化异质性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其深层次的问题是在国家内部的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巨大张力的条件下，如何贯彻国家统一的政治意志？如何实现边疆的有效治理？中央政府对上述困难的攻克也是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建构的逻辑出发点。在此出发点关照下，1949年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构建了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全国动员体制—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纵向三位一体的边疆治理体系，其建构逻辑是以“政治集权”贯彻国家政治意志，以区域自治作为“行政分权”来灵活处理边疆与国家关系作为顶层设计。同时实施“一竿子插到底”的全局动员机制来克服边疆的发展障碍和实现中央权威下沉到边疆基层社会。改革开放后又实施横向的地域协调发展政策，以实现边疆与内地共同富裕的目标。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举措在实践中解决了边疆地区族群、地域、经济发展和国家关系中的矛盾，在国家内部所有国民中贯彻国家政治意志，粉碎了分裂主义，维护了国家完整统一。

【关键词】：边疆治理 治理逻辑 国家治理体系 发展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1)06-0050-06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标志着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重新屹立。新中国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帝制王朝时代的地理版图和规模庞大的边疆。¹实际上，新中国的边疆治理面对的不仅仅是辽阔的地理边疆，更困难的挑战在于广阔的边疆地区充满着文化、民族的异质性，社会结构的多元性以及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性。边疆地区因而同时具有政治地理属性、族群和多元亚文化特征。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是构建国家认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边疆地区蕴含如此宽泛的意义上内涵是国家治理的巨大挑战，尤其是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念和边疆地方的现实之间充满巨大的张力。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国民享有的共同文化、共同价值观越是广泛和深厚，越是容易建立起较为稳固的国家认同，反之国家认同难免被刚性化的社群认同所分割。²为了应对边疆治理的现实与国家建设目标之间的差距，中央政府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国家配套的边疆治理体系，并在社会经济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完善，以贯彻国家政治意志，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目标。

一、“政治集权”与“行政分权”的边疆治理顶层设计

理论上讲，现代主权国家就是要“通过一套制度体制将一定区域的人民整合为一个能够共享制度安排的统一共同体”³，因此，国家制度的构建和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问题。好的制度不仅可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整合社会，而且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好的国家制度如何产生？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能够持久发展、并不断巩固的国家制度，必定是契合了该国的国情和民情，并且能够促使全社会的族群、经济、历史、文化形成内在融合的制度。因此，新中国边疆治理制度的建构需要考虑王朝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经验、边疆与内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结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边疆与其他地区的关系结构。

秦汉以来，中国形成了成熟的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允许边疆民族地区奉行与内地有一定差异的治理制度，边疆在社会制度、

¹作者简介：罗静，女，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边疆治理、边疆社会发展研究。

²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项目“乡村现代化背景下边疆传统村庄消失问题调研”（项目编号：GQZD202001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大型学科奠基性项目“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专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生产方式和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治理权，这些治理制度包括羁縻制度、边郡制、羁縻州府、册封制、土司制等不同形式。尽管边疆地区都承认中央王朝的最高统治，但是中国边疆与其他地区的关系结构不是单一的地域二元关系，而是包涵着多重差异的结构关系，包括族群宗教结构、阶层结构、经济要素分配结构、社会结构等。同时，边疆社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历史上边疆社会内部的宗族、宗教、阶层等关系复杂林立。因此，新中国边疆治理体系顶层设计的首要任务是建构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国家内在契合的政治制度，这也是边疆治理体系的逻辑出发点。

边疆治理制度要完成国家的内在契合，在广袤的边疆建构起具有稳固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国家认同，这不仅是边疆治理的目标，也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主权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但对于中国这样疆域辽阔又古老的大国而言，要实现这种契合并不容易。近代以来，辛亥革命虽然成功推翻了帝制，但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国家陷入了军阀混战的状态，甚至还出现了国家政体层面上帝制与共和制交替的混乱局面。从世界历史来看也有类似经历的国家，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几个世纪的波旁王朝，终结了君主制，但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在很长时期内陷入政治体制不稳定的痛苦，直到1958年戴高乐实施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⁴后才建立了一个相对稳定有效的政府，才较好地实现了国家内部的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任何人都没有预见到（马克思当然从未做过这种预言），‘先进的’西方世界中最现代的革命理论竟然会深深根植于‘落后的’亚洲这片最古老的国土上”⁵。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初创之时，已有的理论都难以完全设计出适合中国的边疆治理体系，新中国的边疆治理只能从实践中一步步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根据边疆民族地区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条件做出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成为边疆治理的根本政治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边疆治理体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适合中国国情和民情的制度。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通过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区域自治制度，成功地动员和组织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加入到革命阵营共同抵御外侮。《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等纲领性文件是在抗战时期形成的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理论总结。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宣告成立，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成功。革命战争时期实施区域自治制度，不仅广泛地团结了边疆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还有力地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一律平等，废除了过去的阶级压迫，从政治上确立了各民族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在制度上保障边疆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如何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理解边疆治理体系的核心。放眼近代以来世界上的政治组织，国家治理结构形式可以简单地分为单一制（共和）和复合制（联邦制）两种。从治理效能的角度来讲，人口和地理规模巨大的国家采用复合制（联邦制）居多。中国是采用单一制国家治理形式的大国，中央政府在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采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特殊的补充治理制度，是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对国家内部的某些地区让渡部分治权给地方的制度安排，目的是使国家治理效能最大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与其他国家有自治权的“地方自治”有着根本不同。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民族自治区制度是维护中央政府权力的前提下的区域自治，自治区居民都是中国公民，有履行宪法职责、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此外，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参考中国王朝时期边疆治理的历史传统，在新历史阶段，解决新问题的政治智慧的表现。王朝中国自秦汉以来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局面，在国家微观治理体现为“皇权不下县”，即实际执政的系列（政统）和知道应该这样统治天下的系列（道统）的是儒家政治理论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的一个重要事实⁶。这种在政治上实施中央集权的同时在地方治理上实施行政分权是维持大国统治和有效治理的最好方式。政治与行政分别而行的治理经验不仅在中国历史中有良好的体现，世界历史中也有反面的例证。本文前面所提及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政体交替的局面持续了近200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后政体不稳定的原因在于大革命后的法国实施政治分权，国家内部总是被各种分歧意见撕裂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意志。在一个国家内部没有统一的政治意志是很难动员广大的国民，也很难将中央政府的全部权力和投放在国家想指向的任何目标上面的。更为糟糕的是法国同时还实行行政集权，即国家的具体治理事务都掌管在中央政府的官僚机构里，在地方治理事务上面地方反而没有发言权和管理权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边疆治理顶层

设计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采取了契合国情和民情的“政治集权”和“行政分权”设计，首先保障在国家版图内，包括边疆地区贯彻实施统一的国家政治意志，在实现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通过让渡部分行政权力给地方，来促进国家的内部整合和社会经济各要素之间的高度契合，这样的边疆治理顶层设计确保了国家稳定和安全，使得国家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可以让地方灵活处理复杂的地方事务。

二、中央权威下沉的边疆治理机制

边疆治理体系的顶层政治制度设计的完成并不意味着边疆治理就此可以一劳永逸。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国家内部构建了族际和地域的特殊治理关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因势制宜、因地制宜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通过这样的制度安排确保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但是这样在国家内部构建的族际关系由于制度而趋于固定化，有可能妨碍边疆的治理效能以及在国家全体国民中贯彻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目标，并极力避免政治制度所造成的族群关系结构固化，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实践中需要建立一套“一竿子插到底”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他们构成边疆治理体系的枢纽。

在中央政府边疆治理的实践中，边疆治理体制和机制的核心内容是巩固和推进边疆区域的全部成员对社会主义价值观和新中国的认同，以及由此政治共同体所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把民族或民族国家视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尽管是学者的一家之言，但是这至少表明民众的国家认同多少带有一些主观的成分，边疆治理就是要在实践中实现上述这两个认同，从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新中国在民众生活中具象化。

边疆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具象化是在与国家整体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的，民众在此过程中通过生产与生活的实践来提升对国家整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国边疆与其他地区的互动受到地理条件的严重制约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利用行政力量动员全国的各种资源全方位支持边疆建设。

首先，全国动员支援边疆实施人才调动体制，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向边疆基层派驻“工作队”。“工作队”是中国共产党进行边疆基层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推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边疆治理体制和机制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各地，尤其是东部大城市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干部、工人、科技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到边疆扎根。1958年到1963年，中央政府从内地动员了570万青年到边疆和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的开发和建设。他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边疆参加建设，在边疆成家立业，默默奋斗几十载，与当地居民共同生产生活，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⁹他们对边疆社会结构的改造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产生了长期影响，对边疆居民和文化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正是这几百万知识青年在边疆几十年的驻扎，不仅推动了边疆社会的巨大变化，而且将中央政府权威下沉到边疆基层社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动员各级政府组织工作队深入偏远乡村进行精准扶贫的帮扶工作，其中有很多是边疆民族地区。2014年精准扶贫实施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2020年3月仍然在岗的有91.8万人¹¹。

其次，中央政府史无前例地组织了内地大量的工厂和生产物质搬迁到边疆，支援边疆的经济建设。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国家实施三线建设战略，内地大批工厂迁移到边疆地区。1964年至1980年三线建设的17年间，国家对三线建设工程累计投入资金2000余亿元，在三线地区建成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近2000个。在交通闭塞、经济薄弱的内地和边疆修建公路25万公里；修通了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太焦、焦枝、枝柳、阳安以及青藏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铁路干线（总里程约8000公里）；建成了军、民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45个，以及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30个；在西部和边疆地区聚集并培养了一支强大的科技、工业队伍，仅军工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万名。¹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在边疆治理实践中制定全国动员的边疆治理体制和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还非常落后的年代里，实现了边疆与其他地区的深入互动和经济要素的全国统筹。此过程不仅帮助全国民众更深入地认识了边疆，也增强了边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以及广泛地传播贯彻社会主义价值观，实现了中央权威下沉到基层社会。全国动员机制还有一个重要制度

意义，即从体制上成功避免了边疆地区陷入由于自身原初条件限制的发展陷阱，制度性地解决了全国民众参与边疆建设的动力问题。毫无疑问，全国动员机制是边疆治理体制的核心内容，是把中央政府通过生产建设实践将中央权威下沉到边疆基层、在边疆建设中贯彻国家政治意志、实现国家建设目标结合起来的工作枢纽，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三、与时俱进的边疆与其他区域横向协调政策

随着时代的发展，边疆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亟需解决。在边疆治理制度的大框架结构中，全国动员作为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边疆治理工作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后难以为继，因为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重要手段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难以持续实施大规模的跨地区资源调动。同时，中央政府的工作重心全面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国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大的调整，最具代表性的是深圳¹³，深圳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从小渔村一跃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最前沿，继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对陆地边疆的开发建设方式也有所调整。

第一，中央政府以中央规划的形式将支援边疆建设制度化。20世纪80年代初，中央责成当时的国家计委牵头，由十几个部委参与制订了《边疆建设规划草案》。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各地经济建设都急需经费的情况下，中央财政连续3年每年拨出专款4亿元，甚至单独编制边疆地区发展规划，促使边疆地区得到快速发展。¹⁴

第二，中央政府利用宏观政策引导社会资源向边疆地区倾斜。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逐渐在经济中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中央政府财政支持对于边疆地区发展的驱动呈现式微的趋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边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随后再度扩大并且日趋严重的过程。¹⁵1998年西部地区人均GDP为4052元，折合488美元，比东部低1.34倍，西部地区的GDP仅占全国GDP的13.49%，¹⁶西部和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出现的差距越来越大，广大的陆地边疆地区大多在西部。同时有关研究也表明全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对边疆地区贫困减少的作用并不明显。¹⁷因此在21世纪初，中央政府因应时代的变化，实施了“兴边富民行动”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目的在于通过政策手段引导社会资源向边疆地区倾斜，弥补边疆治理的政治制度和治理体制的缝隙，缩小边疆与其他地区的差距。

兴边富民行动是1998年由国家民委首先倡导并推动的工作，覆盖了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云南、西藏、甘肃、新疆9个边疆省区的140个陆地边境县（市、区、旗）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¹⁸，这些区域的面积达190多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0%¹⁹。中央政府在20世纪末实施兴边富民行动的同时还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²⁰中国西部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大聚居、小杂居的地区，至今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最为集中的区域，因此西部大开发也就是民族地区大开发²¹。“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兴边富民行动”旨在利用中央行政权力对生产资源进行地区之间逆市场化配置，将资源向边疆等落后地区倾斜，以达到国家内部的地区协调发展。研究表明，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通过大量的实物资本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促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从趋异转向收敛。²²

第三，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制定了经济发达地区对边疆的对口支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将边疆与内地的人员和经济交流制度化 and 固定化。1979年通过中央52号文件以国家大政策的形式将“对口支援”正式确定下来。1980年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全方位对口支援西藏的工作已经开始。2010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全国19个省市启动新一轮的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第四，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互动的广度和深度在人类历史上都是首次，中国的陆地边疆在大历史背景下也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边疆治理也面临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中国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因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在全面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下，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国内的社会经济建设问题，周边国家对陆地边疆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多，由此中央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治理方略和政策。对外而言，陆地边疆分别与邻国以契约的形式建立了国家之间多边或者双边的贸易通道（走廊）²³，这些“走廊”为边疆全面对外开放带来新的机遇和空间，也使得边疆治理有了新的挑战。为了因应这些挑战，中央政府建立了自由贸易区，截至2020年底自贸区数量增

至 18 个²⁴，尤其值得注意的广西、云南和黑龙江是中国首次在陆地边疆地区布局自贸试验区。新时代的边疆被赋予新的内涵：广西自贸区将通过深化与东盟的开放合作、推动建设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云南自贸区将通过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周边国家合作发展，建设连接南亚东南亚大通道的重要节点；黑龙江自贸区将推动东北全面振兴、着力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建设面向俄罗斯及东北亚的交通物流枢纽等。

四、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构建顶层的制度设计，并在此制度下形成一套治理体系，方能使得边疆与整个国家和社会融合为一个有机政治共同体。边疆治理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马克思所表达的要国家内部达成“一种契约”²⁵。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地理规模巨大的巨型政治体，其内部的这种“契约”或者说治理结构必定是多层次的，自上而下包括国家政治制度，国家制度安排下用以协调各相关要素的体制或机制，根据时代而灵活处理治理难题的宏观政策。这三个层面的“契约”构成了边疆治理体系。

上述三个层面的“契约”的构建始终紧密围绕两大国家建设目标：一是对边疆人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国家认同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认同的塑造，使其变成合格的公民。二是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使得边疆各民族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边疆治理体系的构建要围绕上述国家建设目标，在实践中很好地处理中央与边疆权力支配关系，边疆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协作关系等。

边疆治理体系的构成逻辑便是要很好地处理上述结构关系。首先是处理中央与边疆的权力支配关系。中央政府在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上赋予边疆以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同时以政治集权来贯彻统一的国家政治意志，在边疆民众中建立广泛深厚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认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很好地处理了中央与边疆的权力关系，但是在这种政治格局下容易造成族际和地域关系固化，为此中央政府实施“一竿子插到底”的全国动员机制，以克服边疆的地理发展障碍，提高边疆治理效能的同时在全国广泛深入贯彻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观，使得中央权威下沉到边疆基层。其次对于边疆与其他区域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央政府与时俱进地采取对口支援、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沿边开放等宏观政策，灵活地处理不同时代出现的挑战，以实现边疆与内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总体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边疆治理体系是由“政治制度一体制机制一宏观政策”构成的纵向三位一体政治规则体系，他们之间相辅相成，协调运转，保障国家整体秩序，推动边疆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经 70 多年的持续建设和发展，今日中国的边疆已经不是地理上的边缘之地和拱卫国家核心的边缘地带，而是作为建设国家的重要力量与其他地区一起平等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未来，边疆和国家的结构关系也会发生改变，会迫使既有的机制或者政策发生变化，但是不管未来如何改变，边疆治理体系的出发点和逻辑将永远朝向构建稳固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方向继续完善。

注释：

1 狭义的边疆是指有边境线的省份。中国有 2.2 万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陆地边境线所涵盖的 9 个省份为笔者研究的边疆省份，它们的地理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61.46%。广义的边疆还包括海洋领土。

2 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 年第 2 期。

3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 年第 8 期。

-
- 4[法]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30页。
- 5[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页。
- 6 费孝通:《论师儒》,费孝通、吴晗等著:《皇权与绅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 7[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01页。
- 8 罗静:《空间区隔与边疆治理——以中国边疆贫困和国家扶贫行动探讨为中心》,《中国边疆学》(第12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26页。
- 9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新疆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二〇一〇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
- 10 《农十师北屯毛纺厂典型材料》,档案号:017-20-000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档案馆藏;姚勇、周鲲:《20世纪50~60年代内地工厂迁移新疆的历史考察》,《开发研究》2015年第3期。
- 11 习近平:《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0/03-06/9116635.shtml>。
- 12 孙东升:《我国经济建设战略布局的大转变——三线建设决策形成述略》,《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
- 13 深圳与香港接壤,香港回归前受英国殖民统治,因此深圳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就是边疆地区,内地人去深圳要持有“边防证”,在深圳边检站接受检查才可以过关。当时内地人办理边防证需要经过单位证实、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申请手续十分复杂。2008年1月1日,深圳正式停止办理边防证。
- 14 陈宏:《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援疆政策》,《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 15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 16 《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第55、63页。
- 17 李小云、于乐荣、齐顾波:《2000~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作用:一个全国和分区域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10年第4期。
- 18 《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061content_5200277.htm。
- 19 牟本理:《积极开展工作全面推进“兴边富民行动”》,《民族团结》2000年第3期。
- 20 西部大开发覆盖的范围“包括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单列)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其他地区的民族自治州(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实际工作中比照有关政策措施予以照顾”。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1/content_61158.htm,2021年5月28日。

21 牟本理：《在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纪行暨兴边富民行动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2月21日，第11版。

22 刘生龙、王亚华、胡鞍钢：《西部大开发成效与中国区域经济收敛》，《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23 中蒙俄经济走廊、新欧亚大陆桥走廊、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及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24 中国18个自贸区包括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山东、江苏、河北、云南、广西和黑龙江。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页。